

公考作弊案 是对社会公平的“大考”

近日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披露，一团伙长期组织“枪手”跨十余省市替考，涉案金额逾千万元。2014年至2020年，被告人张某洁等组织“枪手”，代替考生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89次，收费逾千万元。案发后，百余名通过作弊手段入职的考生均被开除公职。



社会公平底线需要守护

国家公务员考试是国家人才选拔和职业准入的重要方式，事涉公平正义，社会神经自然异常敏感，舆论眼里容不得半点猫腻。

虽已过去几年，但仍值得反思。组织者的“一条龙”服务为何屡屡得逞，逍遙六年并敛财千万？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回答，形成制度性应对，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
根据报道，其作弊手段确有技术成分：先网络征集“人才库”，选出面容相似的“枪手”，再用计算机合成兼具考生和“枪手”面部特征的照片制作假证。机器合成的“混合脸”，专门针对监考身份核验漏洞。

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反作弊理应升级全程动态核验。法院也建议，进一步提高考务人员的辨别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加大信息化手段的应用，提升考场管理水平和人脸识别技术，减少

替考可能性。

一张张合成照，突破防线89次，让百余名作弊者借由一个个“貌似”的枪手，安然潜入公职队伍。这不仅是技术漏洞，更是对公平底线的挑衅。暴露的监管短板和漏洞，需要正视。

枪手横行，作弊上岸，也是对社会信任的蚕食。还有没有隐于水下的“冰山”待严查深挖？要全面释疑，就不能只盯着一起作弊案，需要更广泛的调查数据和更严密的系统排查。只有把作弊入职者锁定清理，才能留住人心换来信心。

除技术升级、系统核查之外，更需司法严惩。加大违法成本以及对监管人员失察失职的惩处，建立作弊人员终身追责机制。作弊案是对社会公平机制的“大考”。要守护所有考生对公平正义的希望，必须从技术防御与制度惩治上共同着力。

追责不止于开除现职

从法院公布的信息看，虽说并不是所有的作弊考生都构成犯罪，但法院也没有放纵不管——案发后，人民法院通报以作弊手段获取公职的王某等人所在单位，要求严肃处理，相关人员均被开除公职。

倘若法院未作此通报，这百余名通过作弊手段“上岸”的考生，或许仍隐匿于公共部门之中。刑事审判虽以追究刑责为界，但司法机关于裁判之外主动通报的举措，恰恰彰显了司法能动性对公平正义的延伸守护。

只是，刑事案件从侦查到起诉，再到最终裁判落定，均有法定期限制约，故耗时较长。在此期间，作弊者可能已在公职岗位盘踞数月甚至逾年。这不仅虚耗财政资金，更侵蚀公众信任。

那么，因此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，谁来负责？这些人已领取的工资是否可追回？对本该入职的考生造成侵害，又该如何善后？这些都将成为棘手的难题。

因此，有必要建立侦查、起诉、

审判各环节的常态化联动通报机制——侦查机关破获作弊团伙时就应及时预警，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发现违纪线索应同步移送，实现“发现即通报、查实即清退”的闭环管理。

更深层而言，对考试作弊的追责不应止于开除现职。当舞弊成本仅停留在“得逞则获益，败露则归零”的投机层面，尚难以形成足够震慑。因而，不妨进一步强化终身禁考机制，将作弊记录纳入个人诚信体系。

对于挑战国家考试权威的故意违法行为，理应实行“违法记录报告”的刚性原则。正如公务员法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所强调的“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”标准，公权力机关必须筑起诚信堤坝，让每个试图通过作弊混入队伍者付出代价。

广东高院披露的这宗有组织作弊案，犹如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法治建设需从“事后惩处”向“事前预防+事中监管+事后追溯”的全周期治理转型。综合红星新闻、新京报等

(业勤 整理)

“买断人生”的背债游戏，无人能真正“躺赢”

□ 吴霞

据媒体报道，一种名为“职业背债人”的灰色交易正在暗流涌动。参与者以成为失信被执行人为代价，通过配合中介伪造材料、骗取贷款等方式获取一次性高额报酬，实则陷入“一笔钱买断人生”的危险骗局。

从表面看，“职业背债”似乎构成了一个扭曲的利益闭环：中介赚取服务费与大部分资金，原债务人成功脱身，而“背债人”则用未来的信用与部分权利，换取眼下看似可观的现金。然而，这套逻辑建立在多重违法与欺诈的基础之上，其脆弱性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。所谓“报酬”，因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，根本不受法律保护，中介翻脸不认账是常态。更多时候，“背债人”钱未到手，已因贷款诈骗罪锒铛入狱。将个人信用与法律底线作为赌注，换来的往往是征信彻底破产与刑事制裁的双重打击。

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滋生，绝非单方面原因所致。它精准地撬动了多方存在的漏洞。一方面，部分金融机构贷前调查、贷时审查流于形式，甚至存在“内鬼”配合，使得伪造的流水、虚高的评估价得以蒙混过关，暴露出某些机构在业绩压力下风控机制形同虚设。另一方面，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横跨金融、工商、司法等多个领域，涉及伪造证件、

骗取贷款、虚假诉讼等多种手段，而部门间的协同监管与信息共享若存在迟滞，便容易形成打击盲区，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。

除了强化打击与堵塞漏洞，更值得深思的是“职业背债人”现象背后的社会心态。选择走上这条路的，多为自认在正规途径下难以获得大额资金的人。他们未必不清楚后果的严重性，但在“快钱”的诱惑与对自身困境的焦虑下，选择了饮鸩止渴。这种“牺牲长远信用换取眼前利益”的赌徒心理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面对巨大经济落差或生活压力时，部分个体价值观的扭曲与机会主义的滋生。

在依法严厉打击、筑牢金融防火墙的同时，社会也需要关注那些在经济生活中感到无力、容易被“快钱”陷阱蛊惑的群体。通过更完善的普惠金融支持、更畅通的合法致富渠道、更有效的法治与信用教育，帮助他们树立对规则的敬畏、对长远发展的信心，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这类灰色交易存在的土壤。毕竟，任何建立在欺诈与自我毁灭基础上的“交易”，最终买单的只能是参与者自己，而社会整体诚信与金融秩序的代价，更是难以估量。人生无法被真正“买断”，却可能因一念之差而失去信用与自由。

筑牢安全防线，让“体育外卖”走得更远

□ 王恩奎

北京东城区某小区内，教练小郭正为3名小学生提供上门体能训练。这种线上点单、教练上门的“体育外卖”，已成为不少家长和健身爱好者的新选择。专家表示，它打破了传统运动的场地与时间限制，是体育服务便民化、精细化的体现，未来需完善行业规范以促其健康发展。

打开健身APP点单，半小时后教练便带着器材上门授课——如今，这种被称为“体育外卖”的上门健身服务，正成为都市人运动的新选择。但红火背后，资质混乱、安全无保障等问题也逐渐凸显。

“体育外卖”的核心优势在于便民，但安全短板正消解其价值。北京市民王女士曾因线上下单的私教缺乏专业资质，在训练中导致腰部拉伤，维权时却发现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，拒不承担责任；上海某家长反映，上门教练未出示健康证明，让孩子独自接受训练时忧心忡忡。这类问题并非个例：教练资质无审核、服务标准不统一、安全责任难界定、维权渠道不畅通，四大痛点如同悬在行业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，既威胁消费者权益，也制约行业长远发展。

筑牢安全防线，平台责任首当其冲。作为供需对接的核心枢纽，平台不能只做“甩手掌柜”，而应成为安全保

障的“第一道关卡”。一方面，需建立严格的教练准入机制，对从业资质、专业证书、健康状况进行全流程审核，实行“一人一档”公示制度，让消费者下单前能清晰查询；另一方面，应制定标准化服务规范，明确训练前的健康评估、过程中的安全防护、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等要求，同时与教练、消费者签订三方协议，厘清安全责任边界。

政府监管的及时跟进，是安全防线的“压舱石”。相关部门需加快完善行业标准，明确体育、市场监管、卫健等部门的职责分工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同时，畅通12315等维权渠道，对资质造假、安全失责的平台与个人依法处罚，形成“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”的震慑效应。

消费者的安全意识提升，是不可或缺的“第三道防线”。下单前核查教练资质、优先选择有平台保障的服务、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权责，这些细节能有效降低风险。

“体育外卖”的走红，本质上是全民健身需求与服务业态创新的双赢。这种创新值得鼓励，但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。当平台筑牢责任防线、监管织密制度防线、消费者筑牢自我保护防线，“体育外卖”必将摆脱野蛮生长的困境，在安全规范的轨道上稳步前行。